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陈大康◎著

古代小说研究及方法

这些论文的写作过程中，
由于研究的对象和需解决的问题的不同，
也由于自己有意的尝试，
故而这些论文显示出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

中华书局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古代小说研究及方法

陈大康◎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小说研究及方法/陈大康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12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ISBN 978-7-101-05526-9

I. 古… II. 陈… III. 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7.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960 号

书 名 古代小说研究及方法

著 者 陈大康

丛 书 名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术丛书

责任编辑 王传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5½ 插页 2 字数 380 千字

印 数 1—2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526-9

定 价 48.00 元

序

本书所收三十余篇论文按四个专辑编排,如果将这些论文按时间顺序排列,那么就可看出自己的研究兴趣及其变化,一些观点的逐渐形成以及对整个古代小说研究看法的逐渐完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本论文集是对自己近二十年来从事古代小说研究的一次小结,是对以往研究思路的一次清理,当然,同时也是对自以为还可以较长时间留存的论文的一次盘点。收入本书的论文都仍显发表时的原貌,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都已历史,显然不适宜再作修改,即使其中某些地方可能很粗糙幼稚或存有谬误缺漏。

书中第一个专辑是对古代小说研究状况评析。那些论文写作时间相对较后,但因其中提出的问题的在目前阶段确较重要,故列为本书之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鉴于古代小说研究的实际状况,我接连写了《论古代小说研究中的纷争及其意义》与《关于明清小说研究格局的思考》两篇论文,前者着重谈论目前研究体系、模式、思路与方法改善的必要性,后者则是想提醒大家注意研究格局失衡的状况。虽然格局的状况人们都已有感觉,但统计出的数据仍使人大吃一惊:新中国成立44年来明清小说研究论文竟然已有一万五千余篇,而其中88%竟又集中于《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三国演义》、《金瓶梅》、《西游记》与《儒林外史》等七部名著(《红楼梦》更是独占了45%),若加上“三言”、“二拍”等一二十部大家熟悉的作品,那比例更是高于96%。七年后我又做了统计,发现那些比例仍然保持不变,而且整个古代文学的研究格局也同样如此。具体地说,那些论文多在讨论作品的主题、人物、情节、结构以及语言等问题,而且又集中于很少量的一部分作品。比如说,仅在论文题目已标明是讨论宝黛爱情的,论文竟已有400篇之多,论及但论题未标明的还不在于其内。难道真有那么多话可说?这是很可令人质疑的。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个很大的不同:后者的研究是接力棒式的推进,大家都竭力避免重复性研究,发现撞车现象,只得忍痛割爱;前者则不然,重复甚至几成普遍现象。可以打一个不中听的比方:我们似乎在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侧面或不同的角度,反反复复乐此不疲地证明勾股定理,尽管它在几千年前就已被证明了。而且,明清小说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存在,但几十年

来,我们的研究却始终集中于极少一部分作品。对这种现象的进一步思索,不难发现它不仅与我们传统的研究观念、体系相关,而且现行的评价体系与考核制度在其间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基于这种现状,我后来又写了《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些现象的思考》等文,呼吁大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当然,上述两个因素的改变还有着相当的难度,可是要改变,也只有靠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第二个专辑收了15篇古代小说研究的论文。1987年秋,我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师从郭豫适先生攻读元明清文学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当时博士论文打算写从元末明初至清中叶的小说发展历程,因为在该历史阶段,小说的创作在总体上完成了从改编到独创的过渡。做这项工作首先得有个编年为基础,当时以为古代小说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五四”以来已有七十年的历史,这类小说编年肯定早已有人做过。然而努力搜寻后,却发现世上竟无此类编年存在。尽可能准确地按本来的时间顺序展示与小说有关的各事件、现象,是从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分析的必要前提,倘若缺乏清晰的时间概念,或仅据多有颠倒错位的序列作臆测,其论述必然含糊,判断难免失误,而各事件、现象不依时间测度的纠缠混淆,也势必使一些规律、特点的发现受到严重妨碍。于是便自己动手做了个编年。这项工作完成后却发现面对了一个大麻烦:从元末明初到明中叶的近二百年里,通俗小说创作竟是一片空白。传统的研究都是以“有”为研究对象,如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的分析等,“无”向来不在视野之内,想探究也总感到无从说起。然而落实到我的论文,要论述的小说发展历程总共四百年,如果跳过这近二百年的空白,这篇论文还像个什么样?空白的产生总得有个原因,但其探寻却大非易事。最后终于意识到,尽管按文学发展规律,长篇小说在元末明初时已开始出现,但通俗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发展壮大却甚依赖于印刷业支撑,当物质条件尚未准备好之时,该体裁的创作出现空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说的发展,实际上依“创作——传播——创作”的方式不断地反复循环。小说作品既是精神产品,又是文化商品,其行进轨迹既服从文学发展的规律,同时又受商品生产、交换法则的制约,考察其发展历程时,显然不能只囿于文学领域,而应检测小说发展的各个环节,从创作一直追踪到读者的反响,包括作品到达读者手中的方法与途径;同时又考察读者群体的反响如何制约后来的创作。《论小说史上的二百年空白》、《论通俗小说的双重品格》与《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等论文,着重阐述了这一思想,而其他一部分论文则是针对实际问题解决的该思想的具体运用。当年在

研究中获得这样的理解并作论述时,并不清楚自己实际上已将传播学引入了古代小说研究,只是感到唯有这样方能较合理地解释。现在结合传播学研究古代小说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我提出的那些论点在现今的小说史研究中也已经被引用,可在刚开始提出时,却曾被讥为不是文学研究,这与现在被称赞为做了开拓性工作恰成对照。

第三个专辑收了10篇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在不少红学研究者看来,这些论文恐怕有些“另类”,因为它们与现今多数红学论文的路数并不相符。《从数理语言学看后四十回的作者》与《〈红楼梦〉“成书新说”难以成立》两文都是运用数理语言学原理考察作者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陈炳藻先生用数理统计方法考察作品中虚字的出现规律,得出后40回也出自曹雪芹之笔的结论。然而,他在统计学原理运用方面明显地出了点纰漏,而且在《红楼梦》中只抽取了6万字,检验了14个指标,所得的结论自然很可质疑。于是我重做了这项工作,对全书72万字做统计,检验了百余指标,特别是还发现了一些曹雪芹偏爱的词汇,这些词表示的意义在后四十回里是用其他同义词来表示。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尚无条件使用电脑,只能手工统计。前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作,但后四十回的前半部分可能含有曹雪芹的少量残稿。由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逐字逐句地检阅作品,对《红楼梦》自然是滚瓜烂熟了,那些人物、情节便在脑海里活了,其结果便是发现了一些红学家们未曾注意到的问题。比如说,《红楼梦》中居然没有描写李纨与王夫人这对婆媳的对话,作者为什么这样安排,是不是史书中“不书”手法的运用?对此现象作专题研究,还进一步发现,第五回里写李纨的判词与曲子中,有几句话其实一直未能解释得通。此问题并非是钻牛角尖,它有助于对《红楼梦》意旨的了解及其人物关系的理解与把握,而考察的结果,则是《论李纨判词之谜》一文。作品读得烂熟之后,又发现贾府日常生活的有序运转,有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与制度在支撑,作品中关于经济情况的点滴交代,此时在脑海中也融成了较完整的经济体系,于是便写了《论荣府的管理机构与制度》与《论贾府经济体系的崩溃》。后一文中有个问题较为有趣,即历来人们都认为贾府收的是实物地租,乌进孝的那张租单似可为证,但将作品中相关信息集中在一起作系统分析,就可发现贾府收的实际上是货币地租,即使仅就乌进孝所缴的而言,货币地租也已占了很大的比例。总的说来,那些论文不太符合传统的红学论文的路数,我对该路数也不很满意,这一想法在《“眼前无路想回头”》中已有所表露。

最后一个专辑是有关考证的论文。我的有关考证的论文并不多,因为这项工作很不好做。既要相关资料充分,又要推理严密,纵观有关古代小说的考证论文,以上两条并未具备的似占多数。读到这样的考证性文字,我总会想起数学考试时大家常使用的小诀窍:一道题本来证不出,但从已知条件出发可向下推出一块,从求证的结论可向上推一块,当中证不出的那一块是关键,此时就用“显而易见”四字将上下两块衔接起来。玩弄这个小诀窍时谁都没有蒙骗过老师的奢望,因为这正是要考的重点所在,只是卷面上毕竟有两块辅助性的证明,因此一道20分的题总可拿到8到10分。在任何一篇考证性论文里,总有一块是最关键的证明,可是在不少与小说有关的考证性论文中,读到最关键处,往往会遇到“显而易见”这类意思,使读者摸不着头脑,或怀疑自己推理能力的低下。对考证来说,最关键的是有力的资料的充分,欲考证的结果其实已隐含在那些资料的关系之中,所谓考证,只是将那些关系显化而已。考证关键处出现“显而易见”这类意思,实是因为证据不充分的缘故,只得含混过去。有关小说的考证论文中还有个现象,即不严格地按照逻辑法则进行推理。如果说这些作者不懂逻辑,这可能太刻薄了,可是懂逻辑却在这般推理,这又是为什么呢?上述这类现象,在《金瓶梅》作者考证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这也是有《〈金瓶梅〉作者如何考证?》一文的原因。自己搞的一些考证都是些小问题,在阅读过程中接触到一些相关资料,顺手记下,待可讲清一个问题时,便写一篇小文章。它们对小说研究或许可有些帮助,故而也编入此书。

书中所收的论文,发表时间最早的是1986年,最迟的是2005年,时间跨度正好是二十年。这些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由于研究的对象和需解决的问题的不同,也由于自己有意的尝试,故而那些论文显示出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如研究不局限于“有”,诸如具体的作家作品,而是将“无”也同样列为研究对象。如辨析出各种模糊概念,对它们拒绝套用只适用于精确概念的排中律,而代之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如曾设计了可具体操作的方案,去对古代小说中有关不同专题的描写作归类分析,筛选出历史曾有过的社会现象,尽管它们未曾被正史所记载;又如在论述中引入量化分析,或制作若干表格以便更简洁清晰地说明问题,这其实是数学思想与方法的运用,对曾在复旦大学数学系受过四年正规训练的我来说,实是很自然的事,但在当时却曾被誉“为首创”,此方法在今日更得到了许多青年朋友们的拥护;而考证《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时,甚至还运用了数学里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原理。在各种方法运用方面,曾作过不少摸

索,有的较成功,有的则失败了,有时则发觉需综合各种方法方能实际地解决问题。运用的方法不断地在变,但拿定的主意却始终如一,即什么方法能较好地解决问题,就用什么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对这些方法的尝试与体会的重视,有时甚至超过写出的论文本身,编选这部论文集时,也有意识地将是否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意义作为标准之一。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本书便定名为《古代小说研究及方法》。

目 录

序	1
---------	---

一、研究状况评析

论古代小说研究中的纷争及其意义	3
关于明清小说研究格局的思考	14
研究格局严重失衡与高密度重复	
——兼论学术腐败滋生的著述环境	28
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些现象的思考	34
关于《西游记》的两次争辩	
——兼论重新审视研究基础的必要性	44
“小说史”的体例与重写	52

二、古代小说研究

论长篇小说结构形态的演变	61
论小说史上的两百年空白	74
拟话本二论	87
漫谈小说“识语”	97
论通俗小说的双重品格	106
论明清之际的时事小说	118
从繁荣到萧条	
——论清初通俗小说的创作	129
书生的困惑、愤懑与堕落	
——从小说笔记看明代儒贾关系之演变	140
王晔和他的《今世说》	152
论古代小说的史学价值	160
从比较看研究体系的演进	172

论元明中篇传奇小说	184
《热河日记》与中国明清小说戏曲	205
论明初文言小说创作	213
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	226

三、红学研究

论李纨判词之迷	247
论荣府的管理机构与制度	256
从数理语言学看后四十回的作者 ——与陈炳藻先生商榷	270
“《红楼梦》成书新说”难以成立 ——与李贤平同志商榷	286
“有是理乃有是数,有是数即有是理” ——古代数理思想对曹雪芹创作的影响	303
眼前无路想回头	316
《红楼梦》不是飞来峰	319
论贾府的经济体系及其崩溃	333
宝珠·死珠·鱼眼睛 ——论赵姨娘兼谈贾府婢女的归宿	344
宋教仁与《石头记》	355

四、考证

唐寅与“庚黄”	367
也是一首《临江仙》	368
《刘烈女》本事等六则	369
四部明代小说成书年代之辨正	372
《樵史演义》作者考证杂谈	378
《剪灯新话句解》“明嘉靖刻本”辨 ——兼论该书在朝鲜李朝的流传与影响	381
洪梗嫁女等四则	387
《金瓶梅》作者如何考证?	390

一、研究状况评析

论古代小说研究中的纷争及其意义

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可谓是纷争叠起,仅围绕明代“四大奇书”,就有许多重大问题发生了论战。作品的著作权不同程度地遭到怀疑,有的作者身份还须得再作审核。作品问世的年代又出现了新的不同说法,其中时间差竟会长达一二百年,版本嬗变状况自然也被提出重新检讨。《金瓶梅》研究的纷争似乎更醒目,先后被认定为作者的已有五十人之多,而“文人独创说”与“世代累积说”又互为排斥,相持至今。有关作品主题的分析也是如此,几乎每年都可以看到不止一种的新主张。此处远未能将涉及“四大奇书”的分歧概括殆尽,而整个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争端则更是头绪繁多,此伏彼起,如历来就是多事之地的红学界,近来围绕脂评是否为伪作一事又掀波澜,为表明争辩势头正盛增添了新证例。这一连串形形色色的商榷辩驳为什么会在十余年内相继发生?它意味着什么,对研究的发展又会起怎样的作用呢?

一

“新说”接连出现,争辩不断发生,这局面本身就是很值得研究的对象。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对各特定问题论据的考核、观点的辨析、研究思路与论证方法的推敲以及对新说提出者动机的揣度都暂时置于一旁,而去探寻这种带有普遍性现象的成因。本学科的发展历程和争辩发生的时代环境都应该是考虑的因素,但首先需要着手的则应是对头绪繁杂的诸争辩作一抽象,归纳它们的共同特点,由此再进而分析其实质与把握其走向。

最醒目的特点当数翻案性。新说之“新”是相对于“旧”而言,即非耕耘于无人问津的荒野,而是明确地以前人的考述为批判目标。主张《水浒传》成书于嘉靖朝,就是要推翻该作品问世于元末明初的定论,而“世代累积说”又显然是在否定“《金瓶梅》是文人独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命题。许多年来,不少命题已被人们习惯地奉为天经地义,不仅以此为研究的起点,而且获得的成果在实质上也多半为那些命题的逻辑延伸。一旦

初始条件被推翻,相关联的研究必遭否定,这便导致了各种争辩的第二个特点,即极富凶险性。不难设想,如果吴承恩的著作权遭否定,那么长期以来作为《西游记》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吴承恩研究就得被一笔勾销,一些学者数十年之心血也将付诸东流;万一脂评为伪作之说能够成立,则红学界便立即会陷入灾难性的混乱,不知有多少著述都将因失去可靠的依据而化为不着边际的无稽之谈。正因为如此,某些新说一提出便遭到极为激烈的反驳。有关的文章看似仅围绕某个论点展开争辩,但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多年研究成果的保卫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类纷争近年呈现出此起彼伏的态势,但“伏”却并非是有一方臣服,而只是双方话已说尽仍无法统一,暂告休战而已。这就是第三个特点,即“新”、“旧”之说的共存性。共存意味着新说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一则命题形成并长期被人认可总有其原因,否定它须得有令人信服的铁证,各类新说大多缺乏这最后一击的力量而未能取得明显进展,然而共存同样意味着旧说无力提供充分的依据以论证新说之谬。吴承恩的著作权问题是共存现象中较典型的例证。支撑原说最关键的材料,是《淮安府志》中吴承恩名下有《西游记》之书名,反驳者也正是在这根本之处发起了进攻:历史上异书同名的不知有多少,先被误判后又纠正之事也时有发生,怎能轻率地据此著录就作出认定?然而,正如赞同原说者无法证明吴承恩所作的就是小说《西游记》一样,反驳者也提不出相反的力证。缺乏充足理由为前提,谁又能运用排中律作出 A 或非 A 的判断呢?于是双方只能互不妥协地共存。第四个特点则可概括为复杂性。目前已有相当多的学者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各类争辩,但其排列组合却令人眼花缭乱。这里不存在“新”、“旧”概念意义上的站队亮相,对立双方的界定已越出人们习惯性的判断。主张新说者未必就是莽撞的、缺乏宏博基础青年人,惊人之论实际上还常为资深的研究者率先提出。而且,硬是拘泥于“新”、“旧”概念的套用,那只能观察到争辩者立场飘忽不定的表象,甲问题上旧说的艰苦捍卫者,却可能在乙问题上对旧说展开了勇猛的批判。总观全局,明明白白地存在着“新”、“旧”之争,可是一涉及具体,犬牙交错的战线又使原似清晰的思路趋于混乱,纷争的局面也正因此而显得扑朔迷离,变幻多端。

自“五四”以来,古代小说的研究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可是带有上述特点的争辩局面却是首次出现,卷入人数之多,涉及范围之广以及争辩之激烈、深入,都使以往的商榷辩驳之类相形逊色。新说因翻案性与凶险

性而产生较轰动的社会反响,同时引起同行学者的高度警觉。就特定的具体问题而言,关注者对你来我往的争辩都各有判断,或认为新说较为理亏,或感到旧说在勉强招架,可是客观地鸟瞰全体,恐怕还是得用“相持不下”这个词。诸新说中,至今未有可宣称已获得胜利者,实际上略占上风的也不多见,但即便如此,旧说已受到严重伤害。原先的一统天下正在被打破,曾被视为无可置疑的诸命题不得不走上理性的审判台,申辩自己存在的理由,其中不少又恰是不甚充分,阙略处全靠传统的惯性力量作弥补。双方的共存诱发了人们更多的怀疑,并开始以挑剔的眼光审视以往的研究。尽管不少学者只是各自对某个命题提出质疑,切入的角度与侧重的方面也不尽相同,但这些质疑的汇合,却形成了一种要求重新审视以往研究的基础的倾向。

对各纷争的论点略作梳理,可以发现一个论者或许不愿明言但毕竟又客观存在的事实,那就是遭质疑的命题几乎都是二三十年代由鲁迅先生以及胡适、郑振铎等人提出,或是经他们审核而被确认的前人之说。这一辈学者是古代小说研究的开创者,他们从钩辑、梳理与考辨原始资料着手,评判重要的作家作品,分析小说的创作现象并归纳其演进特点与规律,各种基本骨干性的问题差不多都已涉及,而通过这一系列工作的进行,又显示了研究的思路、方法与模式。他们使古代小说的研究成为一门科学,同时也相应地初步构建了研究体系。稍后的治小说者均奉此为楷模,仿效其解决疑难的具体方式,学习其选择、考察与评判问题的标准。他们的研究完全可以说是在第一代开拓者,特别是鲁迅先生及其《中国小说史略》影响的笼罩下而展开,或踪前辈之迹继续深掘,或顺其思路有所拓广。三四十年的辛勤耕耘结出了丰硕果实,这又使当年初显规模的研究体系日益充实丰满。于是,那种研究方法与模式便开始逐渐凝结为一种传统。

体系在第一代学者手中形成,他们的研究成果及其思想方法则是该体系的基础核心,这也是后来治小说者的出发点与依据。在很长的时期里,学者们已习惯于在这体系内作推进式的常态研究,其研究成果的积聚,便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道环绕基础核心的保护层,这时并非没有种种商榷辩驳发生,但它们其实都在这保护层上展开。对任何学科体系的巩固来说,这类争论都是正常的必然现象,组成保护层的各部分内容自然得首当其冲地受到检验,在检验过程中不断地被调整甚至更换,处置的标准则是视其实质是否与基础核心相符合。这一动荡过程最后逐渐趋于稳定,它意味着整个体系的巩固与成熟,相应的,那些构成其基础核心的命题与研究思想因不断得

到强化而慢慢地变成了一个“硬核”。

今日之纷争与以往商榷辩驳的差别正在这里,它不是发生于体系形成过程之中,而是在体系巩固成熟之后;不是以调整或更换保护层中的某一部分内容为目的,而是直截了当地对体系的基础命题提出质疑,这质疑本身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对传统的研究方法、模式的不满。个别人的质疑可当作偶然出现的奇谈怪论而不予理会,众多质疑的相继提出则迫使人正视它们的存在,因为这不只是表明要求审视体系或其基础核心的呼声业已萌生,实际上体系已经面临公然的挑战,而挑战的态势一旦形成,构成挑战的各种新说究竟能否成立反倒成为较为次要的事了。

二

当现有的研究体系对某些问题无法顺利地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时,挑战便会出现,诸如此类问题的积累则增强了变革体系的要求,而这严峻局面的形成恰恰意味着该学科遇上了可能产生飞跃性发展的契机。为了作更清楚的阐述,这里不妨稍稍越出小说研究范围而引用其他学科的发展情形为例证。在物理学界,牛顿的经典力学曾长期地被尊奉为尽善尽美的体系,可是到本世纪初,用它解释物质运动与时空关系以及粒子运动时却产生了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坚持尊重客观事实的爱因斯坦等人重新审视了经典力学体系及其基础核心,而结果则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诞生。数学亦是如此。自人类只理解“自然数”到今天,数学体系在几千年内已多次遭到挑战,仅从“无理数”、“虚数”等命名也不难想当年这种挑战的艰苦与激烈。如今,谁都知道这些曾被视为“没有道理”与“虚无缥缈”的怪物,乃是数学基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变革并不等于推翻或彻底否定,如经典力学在一般常态下就仍然是正确的,被摧毁的只是它那似乎无所不能的虚幻魔力;同样,无理数的引入只是扩大了解决问题的范围,有理数体系并未遭否定。即使原先的体系有严重缺陷,其命运也不是简单地被抛弃,天文学中哥白尼体系对于托勒密体系就是一种扬弃与发展的关系。环视各学科,都能看到这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基础的事例,可以说这已是科学发展史的一般规律。原有体系的变革决非是灾难,相反,该学科的飞跃性发展往往是由此而来。

诚然,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迥然不同,但它们却有共同的基本点,即都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人们的认识总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范围也在渐渐扩大,其方式自然需要不断地相应完善,这就是引起体系变革的

内在动因。古代小说的研究既然是科学学科之一,就不可能逸出这必然规律,而且实际上这类变革已经出现过,只不过较多地带有局部性质而已。就拿《红楼梦》研究这个古代小说研究的子体系来说,它在本世纪内已至少两度发生重大变革。二十年代初,胡适与索隐派的论战曾导致“新红学”的诞生;时隔三十年,以自传说为中心理论的“新红学”也遭到猛烈批判。此后红学界也并未长久地太平无事,其余的暂且不论,至少从近十余年的论文中,又常可读出批判五十年代的批判者的意味。红学是古代小说研究中的“显学”,该子体系动荡的发生也就相对较早,且引人注目,而整个古代小说研究体系迟早也得经历接受挑战的阶段。这里还须得指出必遭挑战的另一原因,那就是它与周围的其他学科一样,自体系形成之日起,危机其实就已经潜伏于其中了。

古代小说研究体系的形成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紧密相连,这部开山性论著结束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局面,它勾勒了古代小说的发展概貌,使人看到历代众多的作品决非杂乱无章堆积而成的集合,而是一个有规律、由种种联系与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的发展序列。这部论著至今仍指导着无数后学,然而鲁迅自己对此书,特别是其中明清部分的论述却不甚满意,且“时虑讹谬”,正是这种心情使他写下了一则“后记”与该书一起梓行:

其第十六篇以下,草稿则久置案头,时有更定,然识力俭隘,观览又不周洽,不特于明清小说阙略尚多,即近时作者如魏子安、韩子云辈之名,亦缘他事相牵,未遑博访。况小说初刻,多有序跋,可借知成书年代及其撰人,而旧本希觐,仅获新书,贾人草率,于本文之外,大率刊落,用以编录,亦复依据寡薄,时虑讹谬。唯更历岁月,或能小小妥帖耳。而时会交迫,当复印行,乃任其不备,辄付排印。

此非故作谦虚之语,而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在自道实情。研究体系已初具规模,但某些方面的“依据寡薄”与“不备”却是其基础的一道裂痕,由此还会派生出许多其他问题,难怪先生要将这部分书稿“久置案头”,迟迟不予付梓,而今日之纷争也正是大多发生在明清小说的研究之中。

任何学科的开山宗师都会遇上这类性质的问题,只是程度可能有所不同,而他们之所以被尊为开山宗师,则是因为在两个方面都同时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是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但开启无穷的法门并不